

8

想像的他者・他者的想像： 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

彭榮邦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心理學與人類學雖然是分立的兩門現代學科，但是兩者之間的知識滲透和挪用其實早有歷史可循，也有了一定的規模。以心理學而言，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文化」這個原屬於人類學的概念範疇被大量地跨界使用，逐漸形成了包括族群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以及較晚近出現的本土心理學等以「文化」為核心概念的知識區塊。這片知識領域的開疆闢土，常被稱為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彷彿讓心理學有了新的視野，看見了迥異以往的知識地景。

表面上看來，心理學的「文化轉向」似乎是心理學與人類學之間的一次正向交流，一次成功的知識跨界。然而這個故事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本文主張，歐洲在漫長的殖民歷史中，對於他者 (the Other) 已經形成了一種顛倒現實的想像與認識，而這樣的想像亦為諸如心理學等現代學科所繼承，因此我們必須從「心理學如何再現他者」的問題意識出發，批判而且歷史地考察心理學與他者之間的權力——知識——欲望關係，才能理解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的真正意涵。透過這樣的考察，本文指出，就與他者的關係而言，心理學一直是以差辨權力部署的方式在運作著。早期心理學以「種族」這個差異性能指來再現他者，並且在心理學實踐中琢磨出一種以量化工具來再現他者差異的強大模式。後來雖然「種族」這個差異性能指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後逐漸式微，但是心理學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再現他者的意圖，而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後，從人類學挪用了「文化」的概念來作為新的差異性能指。

因此，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其主要意涵是心理學的話語性實踐以「文化」這個新的差異性能指，替換了「種族」這個舊的差異性能指。這個差異性能

指的改變，並不必然意味著心理學與他者的關係有了什麼根本的改變。對於心理學的他者而言，再現「文化他者」因此成為一個有多重前線的戰役：不僅在美國本土，也在全球心理學的非傳統中心；它也成為了一個有多重形式的戰役：不僅在心理學的現有體制內進行爭取代表權的制度性抗爭，在知識上為再現的形式和權力抗爭，也必須要在欲望上從與美國主流心理學的鏡像糾葛中掙扎出自己的實踐道路。

關鍵詞：文化轉向，他者，種族，文化，差異性能指，權力——知識欲望關係，差辨權力部署

從一四九二年到一九九〇年代，我們所面對的不是變化、斷裂，和差異，而毋寧是壓抑、失憶，和刻意迴避實在的多樣性，無論在文化還是在心理上皆然。我們所面對的，是由矇蔽之眼所見的扭曲世界。(Sardar et al. 1993:88)

有人曾經說，這世界上有兩種白人：一種的身邊總是以白人居多，而另一種則是場內唯一的白人。或許只有在這時候，他們才會初次發現，那些處於其他社會的人們的真正處境，以此為喻，也就是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真正處境：總是被當作少數人，總是在邊緣討生活，總是達不到標準，總是沒有發言權。(Young 2003:1)

他者與觀看世界之眼

1993年，在哥倫布歷史性地橫渡大西洋的五百年後，印度政治心理學學者南地 (Ashis Nandy) 以及兩位穆斯林世界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薩達爾 (Ziauddin Sardar) 與戴維斯 (Merryl Wyn Davies)，在《野蠻

的他者：關於西方種族主義的宣言》(*Barbaric Others: A Manifesto on Western Racism*) 這本輕薄短小、但卻鏗鏘有力的小書裡，重新回顧了這個歷史事件以及它的全球性後果。一般認定，哥倫布的這次航行之所以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在初次西渡的航程中意外地發現了「新世界」。三位作者承認，那次航程的確是大西洋兩端的兩個世界之間的一場「史無前例的相遇」(Sardar et al. 1993:1)，但是他們認為，哥倫布並未因此而發現了什麼「新」事物；事實上，哥倫布所代表的舊世界歐洲，是錯過而非發現了新世界的「新」所代表的新意。

作者指出，在哥倫布登陸新大陸前的幾個世紀裡，歐洲對於異族(Other People)以及整個自然世界，已然形成了一種「受到焦慮所支配的認識」(anxiety-ridden perception) (同上引：1)。由於這些異族(或他者[the Others])生活在歐洲的觸角未及之處，因此這樣的認識(或想像[imagination])主要是來自於「盤旋在西方心靈內部的恐懼、幻想，和魔鬼」(同上引：1)，而不是來自於與他者的實際接觸經驗。他們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對於異族的認識太過於根深蒂固，以致於早就成為「構成歐洲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同上引：1)。基於這樣的前提，這個「1492年的歷史事件」，對於歐洲而言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更生機會：不僅可以藉此擺脫長久以來對於陌生他者的焦慮，也得以在非歐洲的他者之間重新界定自己。

歷史上，歐洲終究是錯過了這個史無前例的機會，沒有真正地與他者的他異性相遇。然而，比錯失機會更為重要的是，真正的相遇沒有發生並不是個意外，而是有某種結構性的因素讓它無從發生。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歐洲的觀看世界之眼(*oculus mundi*)是被蒙蔽的目光(*blinded gaze*)，它使得歐洲無法真正地與他者相遇：

當西方之眼……轉而觀察不是歐洲或西方的事物時，它
是被蒙蔽的。當它在觀察他者時，這隻觀看世界之眼，

很矛盾地，會被它自己的認識和先見所蒙蔽。它不僅僅是幫著扭曲他者的面貌，事實上，它更透過歐洲自己內在的惡魔——歐洲的恐懼、焦慮和被否認的自我——來創造出他者的樣貌。（同上引：88）

歐洲自己的「認識與先見」，亦即，它自己的想像和預期，成了歐洲在凝視他者時主要的視覺功能 (visual function)。¹ 結果，當大西洋兩端的兩個世界在 1492 年終於相會時，歐洲長久以來對於他者的想像不僅沒有被新奇的經驗所打破，反倒是藉此「取得了肉身」（acquired flesh, 同上引：88）：原來內在於歐洲心靈的，化身為外在世界裡可被觀察的、最終可被掌握的事物。現實世界中他者的主體性——亦即，作為關切自己事務、以各種不同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是被否定的；他們屈從在蒙蔽之眼底下。歐洲於是：

開始治理他者，與他者互動，彷彿他者和它對他們的認識之間並無差別。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基於各種實用考量，被湊成一個單獨而龐大的非我族類 (category of Otherness)。他者的獨特性，消失在所有他者所共享的一般性當中，那就是和西方有所區別。至於這個區別到底是什麼，則留給專家或專業的人來爭辯。（同上引：89，粗體字為作者強調）

因此，這個發生於 1492 年的歷史事件，它的真正重要性在於，

¹ Jose Rabasa (1995) 在〈地圖的寓言〉(“Allegories of Atlas”)一文中，對於歷史的「視覺功能」有相當傑出的闡述。他的主要觀點是，在地圖繪製的過程中，歐洲歷史作為一種視覺功能，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地理空間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它「不但決定了什麼是現代，也決定了什麼是非歐洲、有別於西方的他者」（同上引：91）；換言之，它標誌著一個發生了某種現實的顛倒 (perversion of reality)（同上引：91）的關鍵時刻，而在往後的年月裡，這個「現實的顛倒」逐步層層疊疊地形構了歐洲與他者之間的核心關係。作為一本世界地圖集，荷蘭地理學家與製圖者麥卡托 (Gerhardus Mercator) 所編整的《地圖》(1570) 是哥倫布的歷史航程所留下來的最大遺產，因為它是歐洲的蒙蔽之眼所看見的世界，在歷史上的首次具體展演。

我以薩達爾與其他兩位作者在《野蠻的他者》中，對於歐洲與他者的問題性關係之闡述來開始這篇文章，和他們當年之所以重新回顧哥倫布的歷史航程，其實有著一樣的理由：我們依舊活在由 1492 年的事件所開展出來的歷史當中。當某些根本的事物需要改變時，歷史的進展其實是相當緩慢的，特別是當這些需要改變的事物構成了我們看世界的眼睛時，更是如此。

隨著航海技術的更新和哥倫布在航海路線上的突破，歐洲在世界的擴張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的帝國列強就控制了地球上將近百分之九十的領土 (Young 2001)。在往後的年月裡，舊的歐洲帝國列強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式微，而由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新的強權所取代，爭奪對世界的控制；數十年後，看來頑強的蘇聯政權讓人意外地突然崩垮，致使冷戰結構在一九九〇年代結束，而美國至此成為世界上的唯一強權。然而，既使世界的強權角色幾度更迭，強權對世界的控制也有形式上的轉變（亦即，從直接而較為暴力的領土和人民的控制，轉變為間接而較為精緻的、以「世界貿易」之名而行的經濟控制），在這場對世界控制的競爭之中，歐洲的觀看世界之眼並不需要有太大的改變。相反地，正如拉巴薩 (Rabasa 1995) 的妙喻，它就像是強者們都渴望的「凱薩桂冠」一般，有著超越時空和超越國界的向度。「凱薩的功能就像是一個虛

位以待的空格，不同的強者可以填上自己的名字，」拉巴薩這麼說，「如同凱薩這個符號，由麥卡托的《地圖》所揭示的世界，也是個超越歷史和超越國界的劇場，不同國家的投入競逐，會形成不同的帝國形態」（同上引：363）。因此，只要「控制」依舊是與他者互動的主要意圖，觀看世界之眼實際上並不需要改變，就像是凱薩的桂冠一般，它可以被刻上不同的名號，然後被不同的強權所繼承。所以，即便是換了另一個世界強權，支配的形態也有所改變，他者依舊是屈從在蒙蔽之眼底下，很難翻身。

相較於歐洲擴張的漫長歷史，現代大學的建立作為各種分殊知識的專業生產場域，則出現得相當晚近；事實上，直到將近十九和二十世紀，「自由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和學習」的理念和制度基礎，才逐漸成為各個大學的標準 (Rüegg 2004)。因此，在漫長的歷史裡，被歐洲的擴張所背書、所賦予合法性的觀看世界之眼，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歐洲傳統的一部份而為大學所繼承，無可避免地建構了現代學科的觀看世界之眼。

他者與權力——知識——欲望關係

就像是被蛇嚇過的人，看到草繩也以為看到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現代學科所繼承的觀看世界之眼，只能透過它自己被蒙蔽的目光看見在「現實的顛倒」中創造出來的他者，而不是在現實中的他者。歷史上，對於歐洲（或西方）與他者之間的問題性關係，以及歐洲觀看世界之眼的顛倒性的批判，幾乎總是來自於被蒙蔽之眼不當對待、或是目睹如此暴力的他者：這些批判最早出現於受過西方教育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於殖民處境所造成的創傷分析，例如，瑪諾尼 (Octave Mannoni 1990[1950])、法農 (Franz Fanon 1967a[1952])、塞傑

爾 (Aime Cesaire 2000[1955])，以及敏米 (Albert Memmi 1991[1957])。而隨著二次大戰之後的移民潮，某些來自前殖民地的移民或他們的子女在擔任大學教職之後，由於他們對出身之地被邊緣化的感受依舊強烈，於是開始針對西方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西方知識中對他者的未言明預設，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Young 2001)。他們其中較為人所熟知的有：巴巴 (Homi Bhabha)、霍爾 (Stuart Hall)、史碧娃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查克拉巴帝 (Dipesh Chakrabarty)，以及以滔滔雄辯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批判了學院知識中的文化政治，進而促成了後殖民研究這個學術場域的薩依德 (Edward Said)。

如果麥卡托的《地圖》是歐洲的蒙蔽之眼所看見的世界，在歷史上的首次具體展演；在類似的意義上，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則是對於歐洲的觀看世界之眼的存在，首次進行了系統性的揭露與分析。在《東方主義》的一開始，薩依德就以一位法國記者在面對被焚燬的貝魯特城區時的喟嘆，² 來引出他的主要觀點。他細緻地分析了這位記者的感嘆，藉以指出所謂的「東方」，是一項「歐洲的發明」(Said 2003[1978]:1)，是「歐洲對東方的再現」(同上引：1)。他更進一步指出，在東方與歐洲的各種關係面向中，東方是西方「最深、最常一再出現的『異己』[the Other] 意象」。³……東方作為一個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也幫助了對歐洲（或西方）的自我界定」（同上引：1-2）。他接著強調，雖然這個東方是西方所創造或想像出來的再現，但是它絕對不只是想像，也是「歐洲物質文明與文化之整體中的一部份」（同上引：2）。他更進一步提出了以制度化的規訓權力

² 這位法國記者感嘆地說：「這地方似乎一度是屬於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 和聶瓦 (Nerval) (筆下) 的東方。」

³ 在不同的脈絡底下，“the Other” 這個詞，可能意指「作為再現的異己」(the Other as representation)，也可能意指「作為他異者的他者」(the Other as alterity)。這樣的區分，在英文裡往往需要前後文的脈絡才會清楚，但是譯成中文後可以用「異己」和「他異」兩個詞加以區別。

(institutionalized disciplinary power) 這個權力——知識關係為基礎的東方主義意涵，指出歐洲文化透過這個權威性的規訓系統，在「與東方分割對照的過程獲得了力量與認同，並成為東方的代理人甚或是其檯面下隱藏的自我」（同上引：3）。

從歷史辯證的角度觀之，我們是到最近才瞭解，殖民主義是一種多層次的支配形式，它幾乎涉及了他者在生活上的所有層面——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心理的層面。相較於殖民主義的政治與經濟面向的批判，批判性知識分子對於殖民主義的文化與心理層面的指認甚至分析，在理解殖民主義面向的辯證過程中是較晚出現的。一般而言，在處理文化殖民和心理殖民的議題上，批判性知識分子主要是在兩個西方批判傳統裡尋求思想資源：從後結構主義的傳統，例如，德希達 (Derrida 1997[1967]) 的解構主義方法和傅柯 (Foucault 1972[1971]) 的論述分析；或者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傳統——精神分析，特別是拉岡式的精神分析。

把精神分析的思想資源使用於殖民主義的分析，最早可見於瑪諾尼和法農兩人的著作，其中後者除了本身是被殖民者心靈的痛苦自我剖析，同時也是對於前者錯用精神分析為殖民辯護的深刻批判。瑪諾尼 (Mannoni 1950) 是將精神分析的概念工具用來分析心理意義上的所謂「殖民處境」(colonial situation) 的第一人(同上引：18)。法農 (Fanon 1967a[1952]) 肯定瑪諾尼「相當程度地把握了支配被殖民者與殖民者關係的心理現象」（同上引：83），也贊同他對於殖民者阿德勒式的過度補償心理的分析；然而，法農卻對於瑪諾尼以個體發展的觀點，認定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來自童年時期，堅定地表示異議。他認為，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既不是個體發展的 (ontogenetic)，也不是種系的 (phylogenetic)，而是社會根源的 (sociogenetic)、在殖民的歷程中產生

的；它首先是經濟劣勢，而後表皮化 (epidermalized)⁴ 為內在心理情結（同上引：11）。如果把殖民者的心理也納入考慮，法農認為，殖民處境是一種以「雙向自戀」(dual narcissism) 為基礎的「黑——白」關係，而「白人被幽閉在其白中，黑人在其黑中」（同上引：9-10）。法農將殖民處境視為一種根基於自戀的雙向鏡像關係，清楚地是受到拉岡的鏡像階段 (mirror stage) 這個概念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他討論鏡像階段的冗長附註證實這一點（同上引：161）。再加上他強調這種鏡像關係的社會根源性，法農以一種強力而動人的方式，將精神分析的資源轉譯到殖民主義的分析：形塑主體位置的創傷時刻，不僅發生在個體發展的層次上作用，也在社會的層次上作用。我們因此得以將殖民的心理創傷，視為形塑殖民處境中不同殖民主體位置的精神分析時刻 (psychoanalytic moments)。

當薩依德把東方視為西方用以界定自己的一個「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時 (Said 2003[1978]:2)，毫無疑問地，他和瑪諾尼、法農是在同一個方向上思考，特別是後者；把東方界定為西方的想像性再現，薩依德所指涉的是殖民者的主體位置和他所自戀地創造出來的他者，這兩造之間的關連性，這是個很清楚的法農式命題。然而，這個精神分析式的命題，在《東方主義》一書中並沒有被深化，因此前述法農等人著作中的創見，以及他們所發展出來的精神分析概念工具，並沒有在薩依德這裡發揮應有的理論潛力。

在這個關鍵點上，巴巴 (Bhabha 1994) 進行了一次令人讚嘆的理論介入，他在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為殖民論述所打下的基礎上，翻新了殖民論述的概念。首先，他引介了傅柯在後期著作中發展出來的「部署」(apparatus) 概念，並且將殖民論述重新界定為一種差別權力

⁴ 表皮化 (Epidermalization) 是由法農自創的語彙，意指以膚色差異為分野而內化的劣勢感。

的部署 (an apparatus of discriminatory power),⁵ 而權力—知識關係只是它的許多異質性權力策略之一 (同上引：100)。把殖民論述視為一種部署，強調的是權力使用的策略性，它並沒有排除或取代薩依德原來將殖民論述視為一種論述權力的洞察，而是將它重新定位為某個特定時空下許多可供佈置的權力策略之一，亦即，作為殖民論述的一種「論述策略」(discursive strategy, 同上引：95)。更重要的是，欲望也是這個差別權力部署的一個部分；它被界定為扣連著其他可供佈置的權力關係一起運作的權力策略，亦即，作為殖民論述的一種「心理策略」(psychic strategy, 同上引：95)。

其次，藉由給欲望一個在差別權力部署中的理論位置，巴巴進一步將諸如固著性 (fixity)、拒認 (disavowal)、自戀 (narcissism)、戀物癖 (fetishism)、認同過程 (identification) 等精神分析概念，轉譯成思考殖民處境中欲望如何扣連著其他權力關係運作的概念工具。在這些工具的襄助之下，巴巴發現，當殖民論述在面對他者的差異時，會出現「矛盾兩難」(ambivalence, 同上引：95)：「他者總是無法全然被化約為再現，但又不得不被重複地再現，藉以遮掩現實中無法被再現的差異。」這個矛盾兩難的過程，使得殖民主體和作為再現的他者之間出現了一種固著性，而從巴巴的觀點，這可以用「戀物癖」來解讀 (同上引：106)。巴巴更進一步指出，這個戀物的對象或刻板印象，既是監視力量 (surveillance power) 的對象，也是欲望的對象 (object of desire, 同上引：109)；它因而不僅僅是論述權勢作用的場域，也是認同過程 (identification) 的場域。巴巴認為「不同殖民主體位置的形構，就出現在對他者作為再現的自戀式認同 (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

⁵ “Discrimination” 這個英文字，它的一般性意義是「從事物之間感受、察覺和辨識出差異」(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翻譯成中文就是「差異辨識」的意思。因此 “discriminatory” 可以翻譯為「差異辨識的」。在行文中為了避免贅語，所以我以「差別」取代「差異辨識」。

或拒認 (disavowal) 的精神分析時刻當中」(同上引：109-111)。

無疑地，巴巴對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的原創性閱讀，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性進展。在他對殖民論述的概念所進行的精神分析式重構裡，巴巴「升級」了傅柯的權力概念，也為薩依德原來提出僅用來考察殖民論述的論述權勢的「權力——知識」的分析範式，加上了一個精神分析的欲望向度。在他的理論重構之下，原來的範式被擴展為一個得以考察殖民論述的差別權力部署的權力——知識——欲望的分析範式。這個權力——知識——欲望的分析範式以及相關的概念工具，將指引著本文對於心理學與他者的問題性關係的分析。

心理學與他者

我們很少看見主流心理學的文獻討論有關心理學和他者這兩造之間的問題性關係。或許有人會為主流心理學辯護，認為主流心理學對這個問題的忽視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者」這個語彙太過於哲學意味，應該要換成比較實徵式的提問方式，畢竟心理學很久以前就從哲學脫離出來，而且成功地把自己建立為一門實徵科學。

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心理學者喜歡驕傲地宣稱他們做的是實徵科學，因為就歷史而言，被認可為一門實徵科學，是心理學好不容易才從科學社群中掙來的，至少多數的心理學教科書是這麼說。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心理學者都把心理學認定是實徵科學，因為他們就是在這個傳統之中被訓練出來的，經過多年實徵思考的「制約」，實在也很難多做他想。從很多方面來說，實徵主義 (empiricism) 已經成為心理學的基本預設之一，它對於心理學而言，更像是一個學科的意識型態，而不是一個可以敞開心胸討論的理

論取向，正如派克與艾迪森也指出的 (Packer et al. 1989:31)。然而，與一般的信念相反，心理學或許並不如多數心理學者所希望的那麼實徵。

首先，正如心理學者、同時也是相當受到敬重的心理學史學者丹齊格 (Kurt Danziger 1990:2) 所指出的，心理學所處理的，並不是「自然物件」(natural objects)，它所處理的是「測驗分數、量表、反應分配、序列表，還有其他無數由研究者不只是發現，而且是仔細建構出來的」物件。這意味著，心理學者既使宣稱他是在做「觀察」，這個觀察本身已經不只是觀察，而是某種類型的「翻譯」，把客觀世界的物體或事件，翻譯成丹齊格所謂的「心理學物件」(psychological objects, Danziger 2003)。就像丹齊格在這篇提議研究「心理學物件的傳記」的文章中所說的：「任何的實徵觀察都需要某種論述詮釋來賦予可供交流的形式，而所謂的資料並不是什麼未經處理的『發現』，而是按照某些明確或未明言的規則所仔細建構出來的」（同上引：21）。因此，所謂的「實徵觀察」中所預設的自然主義式的、相互獨立的「主體——對象」關係，對心理學的實作而言，是神話多過於事實。

除了實徵主義或許並不適用於心理學之外，它實際上還成為心理學發展的一個阻礙。丹齊格 (Danziger 1997) 就指出，雖然心理學的實徵傳統表面上看起來一片欣欣向榮，理論不斷推陳出新，但是它實際上看不到、更不用說是修正「我們對研究主題所做的一些預設，而這些預設就隱含在我們用來界定研究物件和表述實徵結果的各種 [心理學] 範疇之中」（同上引：7-8）。事情的結果是，以那些用來累積實徵知識的範疇預設而言，心理學者雖然事實上是個「約定主義者」(conventionalists)，但卻表現就像是個「天真的博物學家」(naïve naturalists) 一樣。丹齊格是這麼評論的：「心理學者在工作時，他們平日使用的心理範疇彷彿就再現了自然的類別，而一些基本的 [心理學] 範疇之間的區別，彷彿就反映了心理現象的自然分野」（同上引：

8)。這也就是說，實徵傳統訓練出來的心理學者，預設了某種理論和真實的對應關係 (correspondence)。雖然在歷史上，心理學者試圖從技術層面（亦即，從方法論上的嚴謹）來確證這種對應關係，然而不論他們多努力，他們想要修補的這個關係所依據的，以派克和艾迪森 (Packer and Addison) 的話來說，是「一種有關真理的不可能『對應理論』」，因此儘管在方法論上一再修正，也於事無補 (Packer et al. 1989:28)。

一旦不再假裝是實徵科學，心理學者會赫然發現身處於一個心理學的嶄新場景，這個場景既讓人感到陌生但又充滿挑戰，如果不是帶著隱隱的威脅。他們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開始浮現，雖然這些問題本身並非真的那麼「新」，只是被實徵傳統遮蔽了，所以隱而不見。對於心理學而言，「他者」的問題正是這些「既新又老」的挑戰之一，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心理學不再是白人心理學者的特權領域，而是逐漸被認為是所有人的共同資產時更是如此 (Pickren 2007)。然而，心理學要發現自己的觀看世界之眼是被蒙蔽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心理學往往得走到了歐美世界的邊緣，赫然發現被他者堅定的目光所凝視，或者是受到了來自內部的他者的質疑，才會發現原來他者是真實存在。歷史告訴我們，在多數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實徵傳統的支配之下，心理學對於他者和他們的傳統其實並不慈悲。哈樂戴和何姆斯 (Holliday et al. 2003) 就指出，在歷史上心理學是科學種族主義 (scientific racism) 的幫兇，而少數族裔在美國心理學的歷史，是「被科學種族主義這種理念和意識形態視為對象的這群人他們的故事；科學種族主義不僅是壓迫和排斥他們的共犯，而且也為這樣的壓迫和排斥脫罪」（同上引：47）。皮克任 (Pickren 2004) 在回顧少數族裔和美國心理學在 1966 到 1980 年的關係時也指出，少數族裔的心理學者，是在透過積極的行動和主張之後，才迫使美國主流心理學讓這些非白、非歐裔的人，在心理學中有了一席之地（同上引：

45)。心理學往歐美以外的世界擴張時，它的紀錄也不光彩；誠如斯道博 (Staeuble 2006) 所說的，「被殖民者的知識系統扭曲和破壞，不僅是西方知識建立優越地位的前提，也是殖民結束之後試圖建立其他的知識文化的持續性障礙」，而心理學正是「這個西方知識學科體系的成員之一」（同上引：185）。因此，我們可以很持平地假定，就心理學與他者的關係而言，心理學是以一種差辨權力部署的方式在運作著。

作為一種差辨權力部署的心理學

把支配強加於他人時，為了使奴役合理化，壓迫者使用了科學論述。(Fanon 1967b[1964]:43)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把心理學視為一種差辨權力的部署，心理學是以什麼方式把現實世界中，關切自己事務、以各種不同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再現或建構為可見的、甚至可控制的心理學物件 (psychological objects) ？

首先，我們該如何界定心理學物件？它們又是被以什麼方式建構出來的？丹齊格 (Danziger 2003) 指出，心理學物件，如同其他任何科學物件，它們不只是可以被操控的東西；它們是歷史性地存在著，也的確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如果要以符合它們的存在方式來研究心理學物件，就得研究它們的歷史性 (historicity)，看它們如何成為現在的樣貌；或者，以丹齊格的比喻來說，就是研究它們的「傳記」(biography)。

其次，丹齊格很清楚，就歷史而言，科學心理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本質上是以實驗的概念為範式的實徵性研究實踐 (Danziger

1990)，因此他認為，不應該把心理學物件只認定為是話語性物件，而應該把它們認定為是認識型物件 (*epistemic objects*)，它的形成不僅涉及了話語性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也涉及了非話語性實踐 (*nondiscursive practice*)。⁶ 他進一步闡釋，在心理學物件的形成中，話語性實踐所涉及的，是用來構成這些物件的理論建構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而非話語性實踐所涉及的，則是讓這些理論建構在實徵的典型範例 (*empirical exemplars*) 中得以藉由實例來演示 (*instantiate*) 的操作程序 (*procedures*)。他強調，這些非話語性實踐的操作程序和其中所涉及的工具和儀器，雖然和話語性實踐密切相關，但是並不能被視為話語性實踐的一部份，它們有自己的歷史，不能和話語性實踐的歷史等同看待。總而言之，丹齊格認為，因為心理學的實徵性質，心理學物件「所代表的是一種理論和實徵的結構」（同上引：21），而這兩個構成性的實踐中的任何一個改變了，心理學物件之歷史形貌也會跟著改變。

心理學物件作為認識型物件，丹齊格已經相當程度地為我們琢磨出了一個系統性的探究方式。然而，這還是不夠的。我們從批判性知識分子理解和對抗殖民主義的辯證歷史中學到，作為再現的他者，不僅僅是認識型物件，也是慾望的對象；慾望是差辨權力的部屬中不可或缺の向度。因此，丹齊格將心理學中對於他者的再現視為認識型物件的看法，只提供了我們探究他者在心理學中被再現為心理學物件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他者必須要被科學地再現，但是並無法充分

⁶ 丹齊格在文中使用“discursive”這個字時，和傅柯對同一個字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多數的情況下，傅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把論述 (*discourse*) 和論述的 (*discursive*) 這兩個字的使用，保留給知識的考古學研究，亦即把論述視為事件 (*discourse as event*) 的研究。但是，丹齊格在使用「話語性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 時，是用來指涉那些涉及了理論建構或某種解釋活動的實踐，或者是那些在某個歷史時空條件下原則上可以被理論化或屬於解釋性的實踐。因此，我把丹齊格所使用的“discursive”翻譯為「話語性的」，以跟本文主要以傅柯的論述概念來使用「論述」(*discourse*) 做一個區別。

說明他者的什麼 (what) 要被再現的策略性選擇（例如，為什麼是「智力」？），也無法充分說明他者的再現在歷史上的變化（例如，從他者作為一個統計上的變異，到他者作為一個文化體系的代理人）。這兩者——關於差異性能指 (signifier of difference) 的策略性選擇以及對於這個能指的心理投注 / 撤回 (psychic investment/withdraw)——都指向了差辨權力部屬的慾望向度。

傅柯為了更清楚說明論述權勢用來施展權力的策略在歷史上的改變，在後期的作品中提出了部屬的概念，來修正對他的論述概念太過側重權力運作的同時性 (synchronic) 分析，而忽略了其歷時性 (diachronic) 面向的缺點。他對於部屬的策略性之強調，提供給我們一個理論基礎，來思考心理學對他者施展差辨權力時，慾望到底在心理學物件作為他者的再現的策略性選擇和歷史變化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關於部署的策略性，傅柯 (Foucault 1980:196) 是這麼說的：

部署根本上是策略性的，這意味著我們假定了部署涉及的是對一組力量關係的操控，或許是讓它們往特定的方向發展，阻斷它們，穩定它們，使用它們，諸如此類等等。部署因此總是在鑲嵌在某種權力遊戲之中，但它也總是聯繫著某個知識座落，這個知識座落由它而生，而且也相當程度地制約著它。部署所涉及的就是：支持某種知識類型、也被這種知識類型所支持著的一組力量關係的策略。

傅柯也指出，部署作為一種策略，它的主要功能是為了回應在特定歷史時空底下的某個「迫切的需要」(an urgent need, 同上引：195)。而正如巴巴 (Bhabha 1994) 所言，對於殖民論述而言，這個迫切的需要是遭遇了他者的差異所造成的兩難矛盾：他者必須要再

現，而且是重複地再現，如此才能夠以他者的再現來遮掩他者根本無法被再現的差異。這就是慾望在差別權力的部屬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對於有可能造成創傷的遭遇進行反應的心理策略，作為關連著他者的再現而形塑認同的一場局戲 (a play of identification)。而對於心理學而言，這一場權力、知識和慾望之舞，真實體現在他者作為心理學物件的歷史之中，在他者的再現作為慾望的不可能對象 (impossible object) 的固著和重複之中。

從種族他者到文化他者

問題並不在於人是不是有天生稟賦的生物。人不會飛，鴿子不會說話。問題也不在於某些心理功能有沒有共通性，不管我們在哪裡找到了這些心理功能。巴布亞人會嫉妒，原住民會作夢。問題是，當我們在闡釋儀式、分析生態系統、解釋化石的時間序列或比較語言時，我們到底拿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來做些什麼。（Geertz 1984:268，粗體字為作者強調）

當我們帶著對他者如何在心理學中被再現的敏感度來回看心理學的歷史，我們很難不察覺，一直以來心理學是如何堅持要找到方法來再現他者；這對心理學而言，幾乎就像是個命令句：他者必須被再現，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就歷史而言，心理學最早再現的非歐洲他者，是種族他者 (racial Other)。然而，「種族」這個概念和它的相關理論並不是心理學的發明，而是在歐美世界與他者互動的複雜歷史中生成，而由心理學所繼承。如果從語源來追溯，種族的概念大約出現在十五世紀末期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也就是歐洲人開始向南、最後向西以海路繞過穆斯林世界所支配的東方，尋找不被穆斯林干擾的貿易新途徑的那個時期。「種族」是一種用來區分「我族」(the “Us race”)和「他族」(the “Other race”)的概念，若以巴巴式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種差異性能指 (signifier of difference)。「種族」作為一個能指，最初是來自歐洲世界的傳統文化——語言母體，但是當這個母體被歐洲世界的他者經驗所改變了（例如，奴隸制度或殖民），或是本身因為有了新元素而改變了（例如，演化論思想），「種族」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也會跟著改變。

例如，理查斯 (Richards 1997) 就指出，在傳統的基督教宇宙觀中，「『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信仰的契約」(article of faith)：我們都是諾亞的兒子和媳婦的後代子孫」（同上引：1）。因此，「種族」作為差異性能指，反映的是「家系」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開始擴張的初期，深膚色的非洲人被認為是諾亞被詛咒的兒子含姆的後代。對於當時的歐洲人而言，「黑色」註記著「他族」和「我族」的差異；我們都是諾亞的子孫，但是他們源自被詛咒的含姆，因此「永遠宿命只配當『製煤和汲水』的劣等人」（同上引：1）。

然而，隨著歷史的推演，與他者互動經驗的差別也影響了「種族」所註記的差異。例如，在理查斯的《『種族』、種族主義與心理學：朝向一個反身性的歷史》(“Race”, Racism, and Psychology: Towards a Reflexive History) 一書中，「種族」這個概念在美國和在歐洲的歷史，就沒有辦法被視為同一段歷史，而必須分別以兩個不同的歷史系譜來處理。在美國，那些逃過種族滅絕的美洲原住民多數已經被「圈圍」在保留地因此不構成威脅；因此，對於白種美國人而言，最主要的他者還是活在他們之中的深膚色非洲奴隸。因此，在美國「種族」主要註記的是「黑鬼」與「白人」的對立差異；一直到後來，美國開始有更多的有色人種之後，「種族」的差異註記才變成「有色人種」和「白

人」的對立差異。相對地，由於歐洲在歷史上主要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對非歐洲的他者進行支配，他者主要生活在歐洲世界之外的「原始」或「非文明」地區，因此「種族」這個概念所註記的，是反映了歐洲世界的殖民經驗的「原始」和「文明」的對立差異。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與他者的關係而言，歐洲與美國似乎角色對調了：前殖民地他者大量湧入歐洲世界，因此歐洲被迫從內部面對它者；相反地，美國則成了新的世界霸權，開始更頻繁地與美洲世界之外的他者接觸。這些新的與他者互動的經驗，也從很多方面改變「種族」作為一個有效的差異性能指的命運：它是否能夠繼續被心理投注為他者的再現，合理化對他者的支配，又能有效遮掩他者的差異所造成的惶惶不安。

總之，「種族」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並不是心理學自己的創造發明。然而，心理學的確是在將種族他者建構為一個科學物件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正如理查斯 (Richards 1997) 所指出的，心理學從一開始就深陷於科學種族主義 (scientific racism) 的大業——一種不斷想將種族他者建構為科學物件的意圖——之中。在他另一本重要著作中，理查斯 (Richards 2002) 指認出兩個對心理學的建立影響重大的思潮：第一個思潮是實驗方法論，而其中包含著來自兩方面的影響，實驗／實徵方面是由費區勒 (Gustav Fechner) 和馮特 (William Wundt) 兩位學者所開疆闢土，而統計方面則是由高爾頓 (Francis Galton) 和皮爾森 (Karl Pearson) 兩位學者為理論先驅；第二個思潮是與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和史賓賽 (Herbert Spencer) 有關的演化論思想（同上引：32）。如果我們回顧這兩個思潮對於心理學成為一門實徵科學的影響，但是把焦點放在這兩個思潮如何幫助形構了心理學的話語性實踐與非話語性實踐，我們會發現，這兩個思潮也深刻地影響了種族他者是如何被建構為心理學物件，雖然兩者的影響方式不盡相同。

演化論思想對於許多所謂的「現代科學」都有深刻的影響，心理學自然也包括在內。簡言之，演化論思想最主要的貢獻，是提供了歐洲人一個新的自我形象，把他們從基督教的宇宙觀當中解放出來，不再只以與上帝之間的契約關係來定位自己。然而，這個新的自我形象不僅意味著歐洲人逐漸以「人類物種」(Homo sapiens) 自居，自視為漫長的演化歷史中發展出來的諸多物種之一，也意味著歐洲人所身處的世界也逐漸脫離了聖經的世界。因此，歐洲人與其他物種或是與自然世界的關係，都需要重新理解和界定。演化論思想的旺盛生產能力，就來自於這些尚未解答的問題所引發的熱情和焦慮。以心理學而言，演化論思想提供了一個「全面性的整合架構」，讓心理學得以在包括「動物行為、個體差異、生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並理學、情緒，甚至是『心』本身的屬性」等的領域進行探索 (Richards 1997:1)。從這些新領域的出現，我們可以發現，演化論提供心理學的是一個比較性的同質關係 (comparative homology)，⁷ 讓各種不同的差異，不論是發展的、個體差異的、物種差異的、種族差異和心理差異等，都可以在某種相同性 (sameness) 的假設之下藉由比較而變得可見。而由於演化本質上是一個生物的過程，因此所有的這些比較基本上都是生物性的比較。

因此，就心理學而言，將種族他者形構為心理學物件的話語性實踐，最早也是在生物性的比較上展開的。例如，心理學早期就不斷以「史賓賽假說」(Spencer hypothesis)⁸ 來測量「白種人」和其他「劣種

⁷ 楊 (Young 2001) 在討論傅柯的章節中使用了這個詞。傅柯認為，民族學 (ethnology) 本質上是假設了某種相同性的結構性科學，因此才能對其他文化進行研究；而以楊的話來說，民族學的這種作法，就是預設了一種「比較性的同質關係」(同上引：396-397)。

⁸ 「史賓賽假說」假設，相較於「原始人」，白人在諸如理性和意志等較高能力的功能上，應該分布了較多的能量；因此，「原始人」應該在諸如反應時間 (RT) 之類的簡單工作上，表現得比白人好。正如理查斯 (Richards 1997) 所說的，這個假說的證實或否證，對於非白人來說是一個兩輸的局面。

人」之間的差異，雖然多數的結果並沒有得到證實 (Richards 1997)。然而，這些失敗的嘗試並沒有打擊心理學家在「白種人」和其他「種族」之間尋找差異的決心。當美國的心理學逐漸形成諸如「行為」和「智力」等具有美國特色的心理學範疇之後，⁹「行為表現」和「智商」就成了其他可能差異的所在。例如，美國心理學家就試圖測量「黑鬼」小孩和「白人」小孩在學校表現上的差異，藉此為美國南方持續在教育上進行種族隔離提供科學證據；而美軍心理測驗也被用來為美國移民政策刁難南歐移民做辯護 (Richards 1997)。這些嘗試最後都失敗了：它們不是被證實為科學性不足，就是從社經地位的差異——而非「種族」的差異——可以對表現差異做更好的解釋。

歷史顯示，種族他者作為一個以演化論思想為基礎的心理學物件，在話語性實踐上，逐漸變得難以在社會層面進行辯護。種族差異不斷地被拿來為非白人所受的不公平對待提供科學的辯解，這逐漸引起不只來自於心理學社群內部的反對與批評，也引起了大眾的關注，特別是政治立場較為自由派的報紙和黑人自己辦的雜誌；到了 1930 年，種族心理學作為一個心理學的次要領域，已經受到了很大的社會壓力 (Richards 1997)。然而更重要的是，對於心理學作為一門實徵科學而言，種族他者這個心理學物件，在非話語性實踐中的科學性要求上也站不住腳。歷史證明，「種族」作為一個根本上是生理性的差異性能指，很難在非話語的實踐中，透過實徵操作程序在實驗情境中實例演示為一個科學物件。

丹齊格所謂的非話語性實踐，涉及的主要就是「測量」(measuring) 的問題：如何將話語性實踐中所建構出來的理論或假設，翻成可以測量的變項 (variables)，再藉由實徵的操作程序，將這些理論建構或假設在具體的實驗情境中實例演示出來？在科學種族主義的

⁹ 丹齊格 (Danziger 1997) 系統性地探討了「智力」和「行為」這兩個心理範疇如何在美國心理學中被形構出來。

歷史上，測量一直是個重要的問題意識，特別是對於企圖以實徵方法證實種族差異的科學家更是如此。理查斯 (Richards 1997) 就指出，在科學種族主義的早期，體質人類學家就偏執地想要在頭骨的測量上，「具體展現」(flesh out) 種族差異的證據。整體而言，他們的研究結果對心理學並沒有太大影響，但是他們對測量的偏執，卻實實在在地為心理學家所繼承。

對心理學而言，統計方法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亞於實驗方法，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如果我們考慮的是將種族他者建構成心理學物件的歷史，更是如此。相較於那些偏執的體質人類學家，心理學對於種族差異的建構，有更好的理論建築師。事實上，高爾頓，這個科學種族主義的積極倡議者，也是心理學的統計方法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高爾頓和主要是英國的統計學家的努力下，統計方法成為心理學思考差異、建立差異的最強大工具，它最終構成了心理學當中相對獨立的次學科，也就是心理計量學 (psychometrics)，專門研究測量心理特質的理論與技術。在心理學的早期，由於演化論的影響，偏好統計方法的心理學家關心的是怎麼理論化和測量遺傳特質在個體或種族差異中的展現；隨著「智力」、「行為」和「人格」等新的心理範疇出現，心理計量的理論和技術也跟著修正或更新，用以測量個體和群體差異怎麼展現在這些範疇中，而種族差異當然也包括在內。

透過我們對於心理學的實驗方法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持平地這麼說，這個實驗方法論逐漸成為了心理學最強大的武器：一種包括了在實驗情境中實例演示理論建構的操作程序，和以數量來處理實驗結果的統計方法的量化工具。在歷史上，心理學以這個量化工具來向其他的科學社群證明自己的科學可信度。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特別是就他者的差異如何被建構和測量而言，實驗方法論卻是一個相當強大而獨特的再現差異模式 (mode of representing difference)：它透過基於相同性假設的理論比較來量化地建構他者的差異，並藉由實徵的操作

程序，將這樣的差異在具體的實驗情境中實例演示出來。而正如我們在歷史回顧中看到的，這個再現差異的模式是屬於非話語性實踐，因此和「種族」這個差異性能指的話語性實踐，有相對獨立的存在。這意味著，即使「種族」這個差異性能指，本身經過了差異註記的改變，或是逐漸在話語性實踐上站不住腳，這個再現差異模式並沒有受到影響，甚至還隨著差異註記的變化而自我修正、繼續演化。結果是，「種族」這個能指的消亡並不是大問題，因為只要有另一個足以取代「種族」的差異性能指，心理學仍然可以藉由這個量化工具，有效地創造出心理學物件來再現他者。在這個意義上，他者絕對是可以測量、可以再現的，正如桑代克 (E. L. Thorndike) 所說的，「只要是存在的東西，就一定有某些數目是可以被測量的」（引文來自 Richards 2002:252）。

大約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因為來自社會的壓力和科學社群內部的批評，「種族」不再被投注那麼多的心理能量，在心理學的話語性實踐中已經不太能夠作為一個有效的差異性能指。一直到德國納粹的反猶太人主義興起，美國心理學家才看見（隔著大西洋），「種族」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如何可以在政治上和意識型態上成為正當化壓迫的工具。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納粹大屠殺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心理學中，「種族」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幾乎被撤回了所有的心理能量；「種族」成為一個禁忌，一個被禁止的能指，如果被說出來、被正名了，將可能帶給這個世界無法想像的災難。

然而，對心理學的整體而言，多數的心理學家並不認為將他者再現為數量化的差異是個問題，雖然這樣的量化差異總是隱含著某種與白人常模的比較；因此，並不是心理學不應該再現他者，而是「種族」本身是一個差勁的差異性能指。另一方面，這一個強大的量化工具，也可以有合理化種族歧視以外的使用方式；事實上，自由派的心

理學者、黑人心理學者，或所謂的「少數族裔」心理學家依照經濟和社會的因素來建構差異的理論，並用這個量化工具來爭辯他者的差異實際上並非種族的差異，而是源自經濟和社會的差異 (Holliday et al. 2003)。

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之後，將他者建構為心理學物件的企圖暫時是銷聲匿跡了，一些心理學者轉而質問，為什麼人們那麼想在「種族」上看見差異？這個質問引發了大量對於種族偏見和態度的研究；種族主義 (racism) 而非種族 (race) 本身，成了心理學家反省的重點 (Richards 1997; Samelson 1978)。此外，對於納粹經驗的反省，也讓心理學者轉而更重視人格和群眾對於人的行為影響 (Richards 2002)。這些相關的研究，不僅使得美國心理學家更注意到人是社會性的存在，也激勵他們更積極介入社會議題。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心理學逐漸成為心理學中的顯學，而心理學作為一個整體，也更能夠接受社會脈絡在理解人的行為時的重要性。在某個意義上，這個對脈絡重要性的強調，是文化他者出現的序曲。雖然社會心理學因為在歷史上與社會學的親緣關係，並不偏好以「文化」這個概念來解釋人的行為，但是社會心理學相當程度已經為文化他者 (cultural Other) 的出現鋪好了路，因為「文化」也可以被視為人存在的社會面向之一。

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心理學理解人的方式改變了，美國心理學本身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經歷了相當大的改變，不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以國內而言，除了戰後來自歐洲的移民潮，美國於 1965 年在移民政策上的改變，劇烈地改變了美國人口的「顏色組成」，心理學當然也無法抵抗這樣的變化。愈來愈多的「有色人種」或「少數族裔人士」成為、或爭取成為心理學社群中的一份子。一旦他們加入了這個俱樂部，他們對於心理學有意或無意排除他們在心理學中的代表性／再現 (representation) 不禁感到失望或幻滅。因此，他們一方面要求心理學接納他者（例如，在制度上要求更多的代表性），一方面也為

他們——作為心理學的他者——在心理學中被再現的樣貌（或沒有被再現）提出異議 (Holliday et al. 2003)。歷史上，心理學在美國是以這種方式變得更為多元化 (diversified)。

以國際而言，美國成了世界的兩大霸權之一，為了圍堵共產主義的興起，美國積極和其他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一方面透過政治和經濟的援助，一方面也透過獎助國際學生來分享美國的高等教育資源。結果，美國心理學開始從它傳統的歐美中心，往從來沒有心理學這門學科、或心理學較為微不足道的地方散播開來。大約在 1970 年代，當心理學在這些非傳統中心逐漸站穩了腳步，這些在歐美養成的心理學家開始注意到，他們學得那麼好的心理學，對於他們自己社會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卻顯得「毫不相關」(irrelevant) (Azuma 1984; Sinha 1993)。因此，他們最初爭取的是自己社會裡的問題在心理學應該要被適當地再現，不過後來，他們之中有更多人開始倡議要有自己的心理學，才能更妥切地處理這些問題 (Enriquez 1993; Kim 1990; Mataragnon 1979; Yang 1997)。歷史上，心理學以這種方式變得更為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ed)。

對於心理學而言，「文化」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就出現在這個心理學在美國變得更為多元化、在全球變得更為國際化的戰後處境。在這個逐漸多元又國際化的處境中，心理學的話語性實踐出現了一個空缺：它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種族」的差異性能指。因此，當心理學者從人類學挪用「文化」這個概念來說明他者的差異時，它就很快地就取代了「種族」而成為心理學者偏好的差異性能指，雖然這個概念在人類學者之間存在著一些爭議 (Kuper 1999)。文化相關心理學 (culture-related psychologies)——例如族裔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在 1970 年後的蓬勃發展，就是心理學的差異性能指已經悄悄地換喻 (metonymy) 的歷史證明。

從權力的角度觀察，作為一個差異性能指，「文化」不僅僅是「種

族」的替代，它從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策略上較好的差異性能指——不只是對心理學的既得利益者，對於心理學的他者亦然。首先，它是一個夠抽象的能指，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1940) 所說的：「我們並沒有觀察『文化』，因為這個字所指涉的，不是具體的現實，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這個字在日常上的使用也是這麼含糊」（同上引：2）。但同時，它卻幾乎可以用來指涉任何事情，就像這個跨文化心理學中經常被引用的段落所說的，

文化是由藉著符號習得和傳達的、明白和隱而未顯的行為模式與行為規範所構成，它是人類群體的獨特成就，其中亦包括了文化在工藝上的體現；文化的本質包括了傳統的（亦即，傳承與揀選自歷史的）觀念，特別是依附在這些觀念上的價值；文化系統可能一方面是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也牽制著進一步行動的元素。（Kroeber et al. 1952:181）

在「文化」替代了「種族」成為心理學中的差異性能指之後，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主流心理學和文化相關心理學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爭取「文化」這個概念的詮釋權。再現「文化他者」因此成為一個有多重前線的戰役：不僅在美國本土，也在全球心理學的非傳統中心；它也成為了一個有多重形式的戰役：不僅在心理學的現有體制內進行爭取代表權的制度性抗爭，在知識上為再現的形式和權力抗爭，也必須要在欲望上從與美國主流心理學的鏡像糾葛中掙扎出自己的實踐道路。

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

現在，每個人都在談文化了。對於人類學者而言，文化曾經是與他們的技藝相關的一個詞彙，但現在連土著都用文化來回嗆他們了。(Kuper 1999:2)

心理學和人類學這兩門學科的關係，其實有著相當錯綜複雜的歷史。從人類學的發展歷史來看，它和心理學的關係不一定涇渭分明，對於所謂的「跨界合作」也不必然友善。以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發展為例，人類學學者庫柏 (Kuper 1990) 就指出，由於英國的人類學在早期發展時曾經「依附」在心理學的庇蔭之下，在結構功能學派興起後，至少在 1940 年到 1970 年的期間，都一直企圖和心理學保持距離，甚至有某種嫌惡的態度。而美國的文化人類學雖然和心理學以及精神醫學在「文化與人格研究」(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這個跨學科研究的領域有超過二十年的親密合作關係，但是由於國民性 (national character) 研究所引發的爭議——包括對所謂「遠距文化研究」的疑慮、對「國民性」這個過度簡化、過度心理化的概念的質疑等，在 1950 年之後，文化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對心理學理論的跨界援用，逐漸採取一種防備或敵視的態度，而文化與人格的後繼研究，也悄悄易名為心理人類學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的研究 (LeVine 2001)。

然而，從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曾經風靡一時的「文化與人格研究」的跨界合作，卻成為文化相關心理學——特別是跨文化心理學——在美國心理學出現的先驅和思想養分。然而，「文化」這個原本與人類學技藝息息相關的概念，在跨界引入心理學之後，並沒有迫使美國心理學正視或放棄它的歐洲中心主義 (Eurocentrism) 或美國

中心主義 (Americentrism)；相反地，後續的發展卻正如庫柏 (Kuper 1990) 所警示的，「文化」這個概念似乎成了「種族」這個概念的遁詞 (euphemism, 同上引：14)，在「種族」成為禁忌概念的空缺時刻，逐漸替代了「種族」，成為心理學中用以辨識他者的差異性能指。雖然跨文化心理學的學者曾經表達對於美國主流心理學長期忽視「文化」的不解，也強烈呼籲心理學者在這個心理學逐漸多元化和國際化的時代，不應該再採取一種無視文化 (acultural) 或單一文化 (unicultural) 的立場 (Segall et al. 1998)，但主流心理學主要還是以一種「分而治之」 (compartmentalization) 的策略，來面對來自他者的文化挑戰：它為「文化的研究」 (the study of culture) 圈圍出一個專屬、但卻是次要的領域 (Betancourt et al. 1993)，這其中包括了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族裔心理學以及本土心理學等所謂的「文化相關心理學」，讓它們既能在心理學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卻又不至於威脅到主流心理學某些根深蒂固、但卻往往是無視文化或單一文化的某些核心價值和理念。

因此，雖然文化相關心理學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開始蓬勃發展，甚至被指認為心理學發展中足堪和「認知轉向」 (cognitive turn) 類比的「文化轉向」 (cultural turn)，但是相較於認知心理學在主流心理學研究造成近乎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的革命性發展，心理學中所謂的「文化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Yang 2000)，起碼在目前的階段，是自我期許多過於現實。不僅如此，由於對「文化」這個概念在心理學領域的出現，缺乏一種批判歷史的關照（這是筆者書寫本文的意圖），即便是在文化相關心理學的領域中，也往往以差異性能指的方式來使用「文化」這個概念而不自知（例如，以「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的預設來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使得他者的他異性 (alterity) 無法藉由心理學的研究活動揭露、甚至顛覆心理學既有的歐美中心視野。

人類學學者馬庫斯 (Marcus 2005) 指出，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美國的文化心理學在包括人類學專業和形象的演變、田野工作經驗的實際性質，訴說田野工作故事的方式和傳承、研究對象如何被概念化，以及人類學的首要跨學科伙伴是誰等攸關人類學專業再生產的各個面向，都經歷了很深刻的轉變。他強調，這些轉變並不是來自於人類學內部，而是來自於諸如歷史和文學研究等人文學科，它們在試圖自我更新其社會價值時，對許多人類學所建立的概念框架和立場所進行的批判和創造性的挪用。這股批判的思潮，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和人類學內部的批判聲音匯流，對於人類學知識的實證性提出質疑，轉而將民族誌視為文本和文體 (text and genre) 來進行研究和批判。這股文化批判的浪潮，也改變了人類學在「民族與地方」 (peoples and places) 的傳統主題上對於「文化」的設想。正如馬庫斯所指出的，「如今文化在人類學那裡是非本質主義的、片段式的，而且總是被複雜的世界歷史進程所滲透，在全球與地方之間起著調節作用」（同上引：681）。相較於心理學的「文化轉向」，人類學作為一種文化批判的深刻轉變，雖然挑戰了人類學的傳統預設，但同時也將人類學從傳統的研究領域中解放出來，使得人類學具有「異業複合」的能力，讓它得以成功地在各個新領域開疆闢土，造就人類學研究在當代的繽紛榮景。而在這個當代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裡，他者如何透過民族誌的書寫而再現，也一直是個重要、而且被反覆辯論的主題。

正如我在本文所指出的，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在本質上是用來辨認他者的差異性能指的替換，它從人類學所跨界挪用的思想養分，是人類學在一九八〇年代後的深刻轉變之前的傳統設想，因此對於再現文化他者（或文化他者的自我再現）所涉及的權力——知識——欲望關係，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如果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心理學和人類學的再次相逢可以爆發出什麼火花，對於上一次的「相逢」的重新認識，或許是個起點，這也是本文所期待做出的貢獻。

後記

本論文在準備出版的最後階段，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者的細心指教。兩位審查者不僅肯定本論文的出版價值，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筆者在此深表感激。不過由於兩位審查者對於論文的結構是否需要調整、是否具有明確的方法論、對於「他者」的討論是否夠深入，以及與本土心理學論述之間的關係等，有相當不一樣的看法，因此筆者對於如何進行最後的修改感到十分掙扎。幾經思量，筆者決定不對論文本文進行重大修改，但以增添「後記」的方式，回應審查者的指教，希望可以在保留原本論述架構的情況下，儘可能地澄清上述的問題。

筆者將先針對「他者」(the Other) 這個概念做進一步的澄清，因為它不僅是本文據以成論的關鍵概念，而筆者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也相當程度地決定了本文的書寫策略。首先，正如筆者在「心理學與他者」一節中指出的，「他者」對於心理學而言（特別是主流心理學）是個相對陌生的概念。如果要簡單追溯「他者」這個概念在心理學領域的浮現，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兩條知識系譜：一條系譜出現於受歐陸思潮（主要是現象學）影響的人文心理學著述裡，這些心理學者藉由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對倫理性的根本設想，切入當代心理學在面對他者時所涉及的倫理議題。在這個脈絡之下的「他者」，是列維納斯式的他者 (Levinasian Other)，是以其獨一無二的面容向著我，使我必須有所回應的他人。杜肯大學在 2002 年所出版的 *Psychology for the Other: Levinas, Ethics and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y* (Gantt and Williams 2002) 是相關著述第一次系統性地集結成書。而從 2003 年開始，每年由西雅圖大學心理學系所主辦的「為了他者的心理學研討會」(Psychology for the Other Conference)，則是

學者們彼此切磋砥礪的年度論壇。

另一條「他者」的知識系譜，則是出現在批判心理學或批判心理學史的場域裡（例如：Brock 2006; Brock et al. 2004; Hook 2005; Teo 2005）。這些質疑歐美主體的普遍性、並且將「他者」議題搬到學術檯面的，多數為歐陸或第三世界的學者，他們雜揉的出身背景或生活經驗，讓他們關注隱含於心理學論述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及美國中心主義。他們在論述上所援引的思想資源不以心理學為限，而是呈現相當豐富多元的面貌，其中主要為科學史、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及精神分析等批判性知識傳統，或雜揉了上述思維的後殖民思潮。在這個脈絡之下的「他者」，是被現代學科知識異化、但卻是建構歐美主體性所不可或缺的想像／鏡像他者 (imaginary Other)。

如果參照臺灣學界對「他者」概念的使用，我們也可約略看到兩條類似的知識系譜：較為批判性、受過後殖民思潮洗禮的「他者」概念，多半出現在文化研究的場域，藉以反思當代的知識處境（例如：陳光興 2006；劉紀蕙 2004，2011）；而較為倫理性的「他者」概念，則多是出現在本土心理學的場域，並且已經成為臺灣人文心理學者在討論「療癒」何以發生時的核心概念（例如：余德慧等 2010；余德慧等 2004）。如果比對臺灣與歐美學界對「他者」概念的使用，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心理學論述，特別是本土心理學的論述中，其實還沒有出現過較為批判性、受過後殖民思潮洗禮的「他者」概念。雖然本土心理學的討論中的確出現過對殖民主義的質疑及批判（例如：Hwang 2005；林耀盛 1997；傅大為 1995），但這些討論並沒有超越「殖民 vs. 反殖民」的思考模式，因此後殖民思潮中對於殖民主體與被殖民主體之間的鏡像依存、對於「內化的西方」(internalized West) 的深刻反省等，其實都還在本土心理學論述的視域之外，即便這樣的思辨對於徹底清算與歐美心理學之間的債務關係來說攸關緊要。

因此，本文才會以「他者」的想像維度為主軸，對心理學所謂的

「文化轉向」進行批判性的歷史考察，並以此為思想準備，以便與本土心理學中的「文化」論述展開進一步的對話。不過，礙於篇幅及筆者個人的書寫策略，本文確實未與臺灣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多層次的對話。這個部分，尚待筆者未來以其他論文甚至專書加以補足。

至於在方法論上，筆者的書寫策略在歷史文獻的使用方法上，的確與一般心理學論文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可能會被以為只是單純的「文獻回顧」。如果從傅柯所謂的「認識型」(*episteme*) 來談，一般的心理學論文的「文獻回顧」是在特定的認識型之下（例如，以「文化」為他者的差異性能指），藉由與其他相關文獻的對話，來釐清及界定研究者的研究問題，指出研究成果的利基或貢獻等等。然而，筆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後殖民的論述分析，不是文獻回顧法。因此對筆者而言，在歷史文獻的使用上最重要的判準是這些文獻能否幫助讀者看見歐美世界的他者——那些關切著自己事務、以各種不同樣貌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多數人們——被殖民論述問題化(*problematized*) 的方式及其歷史形構的改變。最後再以此為基礎，為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提供一種理解的可能性。因此在論文的書寫策略上，筆者先從歐美世界的他者如何從具有主體性的他者成為一種想像的他者開始談起，而後進入殖民地知識分子如何從具體的歷史經驗及理論援用中提取權力——知識——欲望關係的部署分析架構，再以此分析架構拆解心理學的差辨權力部署，說明它是如何在其學術實踐中建構出「他者」的形貌。透過這樣的析辨，筆者最後試圖指出，心理學所謂的「文化轉向」並不能太樂觀看待，需要再進一步檢視，因為它可能只是一種差異性能指的替換，而不必然是歐美世界的他者所期待的進步。或許筆者力有未逮，在分析方法與書寫策略上不夠明確，只能藉由後記加以贅述，有待其他學界同仁進一步指教。

參考書目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

2010 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 37(1):63-84。

余德慧等

2004 倫理療癒作為建構臨床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本土心理學研究 22:253-325。

林耀盛

1997 社會心理學本土化：反殖民主義與后現代論述之間。本土心理學研究 8:285-310。

陳光興

2006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市：行人出版社。

傅大為

1995 本土心理學與反殖民主義。本土心理學研究 4:348-352。

劉紀蕙

2004 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市：麥田出版社。

2011 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Azuma, Hiroshi

1984 Psychology in a Non-Western Cou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1):45-55.

Betancourt, Hector, and Steven R. López

1993 The Study of Culture, Ethnicity, and Race in America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6):629-637.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Brock, Adrian C.

2006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rock, Adrian C., Johann Louw, and Willem van Hoorn

2004 *Re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Essays Inspired by the Work of Kurt Danziger*.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Césaire, Aimé

2000[1955]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J. Pinkham, trans. New York: Monthly.

Danziger, Kurt

1990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Naming the Mind: 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3 *Where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Meet: The Biography of Psychological Objects*. In *About Psychology: Essays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D. B. Hill and M. J. Kral, eds. Pp. 19-33.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errida, Jacques

1997[1967]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nriquez, Virgilio G.

1993 *Developing a Filipino Psychology*. I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U. Kim and J. W. Berry, eds. Pp. 152-169.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Series; Vol.17.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Fanon, Frantz

1967a[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R. Philcox, tran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b[1964] *Racism and Culture*. *In* *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Political Essays*. Pp. 31-44. New York: Grove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72[1971]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M. S. Smith,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M. Foucault and C. Gordon, eds. Pp. 194-228.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Gantt, Edwin E., and Richard N. Williams

2002 *Psychology for the Other: Levinas, Ethics, and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84 *Distinguished Lecture: Anti Anti-Relativ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2):263-278.

Holliday, Bertha Garrett, and Angela L. Holmes

2003 *A Tale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A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andbook of Racial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G. Bernal, J. E. Trimble, A. K. Burlew, and F. T. L. Leong, eds. Pp. 15-64.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Hook, Derek

2005 *A Critical Psychology of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 Psychology*

15(4):475-503.

Hwang, Kwang-kuo 黃光國

2005 From Anticolonialism to Postcolonialism: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0(4):228-238.

Kim, Uichol

1990 Indigenous Psychology: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In Appli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Series, Vol.14.)* Richard W. Brislin, ed. Pp. 142-160.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Kroeber, A. L., and Clyde Kluckhohn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useum.

Kuper, Adam

1990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3(3):397-413.

1999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e, Robert A.

2001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1918-1960: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803-818.

Mannoni, Octave

1990[1950] *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rcus, George E.

2005 The Passion of Anthropology in the U. S., Circa 2004.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8(3):673-695.

Mataragnon, Rita H.

1979 The Case for an Indigenous Psychology. *Philippin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1):3-8.

Memmi, Albert

1991[1957]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H. Greenfeld,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discrimination,n.”.

<http://www.oed.com/view/Entry/54060?redirectedFrom=discrimination>

“race,n.6”.

[http://www.oed.com/view/Entry/157031?result=6&rskey=hLkhGG
&";](http://www.oed.com/view/Entry/157031?result=6&rskey=hLkhGG&)

Packer, Martin J., and Richard B. Addison

1989 Introduction. *In* *Entering the Circle: Hermeneutic Investigation in Psychology*. M. J. Packer and R. B. Addison, eds. Pp. 13-3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ickren, Wade

2007 Tension and Opportunity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n Psychology. *History of Psychology* 10(3):279-299.

Pickren, Wade E.

2004 Between the Cup of Principle and the Lip of Practice: Ethnic Minorities and American Psychology, 1966-1980. *History of Psychology* 7(1):45-64.

Rabasa, Jose

1995 Allegories of Atlas. *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Pp. 358-364.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Radcliffe-Brown, A. R.

- 1940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0(1):1-12.

Richards, Graham

- 1997 "Race", Racism, and Psychology: Towards a Reflexive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2 Putting Psychology in Its Place: A Critical Historical Overview. New York: Routledge.

Rüegg, Walter

- 2004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d, Edward W.

- 2003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amelson, Franz

- 1978 From "Race Psychology" to "Studies in Prejudic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ematic Reversal in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4(3):265-278.

Sardar, Ziauddin, Ashis Nandy, and Meryll Wyn Davies

- 1993 Barbaric Others: A Manifesto on Western Racism. London: Pluto Press.

Segall, Marshall H., Walter J. Lonner, and John W. Berry

- 1998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On the Flowering of Culture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10):1101-1110.

Sinha, Durganand

- 1993 Indigenization of Psychology in India and its Relevance. *I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Series; Vol. 17.) U. Kim and J. W. Berry, eds. Pp. 30-43.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Staeuble, Irmingard

- 2006 Psychology in the Eurocentric Orde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lonial Constitution, Cultural Imperialist Expansion,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drian C. Brock, ed. Pp. 183-207. New York, NY U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eo, Thomas

- 2005 The Critique of Psychology: From Kant to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Yang, Kuo-shu 楊國樞

- 1997 Indigenizing Westernized Chinese Psychology. *In* Work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ultures: Eighteen Lives in Social Science. Michael, Bond, ed. Pp. 62-76.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0 Mono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es: The Royal Ro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alanced Global Psycholog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241-263.

Young, Robert J. C.

- 2001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2003 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magining the Other and the Imaginary of the Other: The So-called “Cultural Turn” within Psychology

Rong-Bang Peng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Tzu Chi University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y be separate disciplines, but the mutual penetr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has been historically rather common and sometimes occurred on a considerable scale. In the case of psychology, “culture,” originally a disciplinary asset of anthropology, became from the 1970s a widely used notion to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The wide acceptance of this term eventually gave birth to several sub-disciplines within psychology such as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ethnic psychology, and indigenous psychology, which all claim the notion of culture as a constitutive core. The emergence of these culture-related psychologies is often heralded by their advocates as the “cultural turn” within psychology, as if the notion of “culture” has revealed new vistas to the field, forever changing it.

On the face of it, the “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y seems to represent a productiv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a successful transposition of knowledge. However, the story is not so simple as it seem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over the long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Europeans have construed a way of relating to the Other that is at once imaginary and a “perversion of reality.” Most importantly, this imaginary relationship to the Other was inherited by modern disciplines, psychology

included.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logy's "cultural turn," we need to problematize how the field represents the Other and critically examine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 to the Other from the analytic paradigm of power-knowledge-desire. By critically analyzing the field's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Other,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at psychology has in fact functioned as an apparatus of discriminatory power. The notion of "race" was initially used as to signify the difference of the Other, and psychology created a powerful way to represent that difference with its quantifying tools. "Race" as a signifier of difference eventually faded from scholarly practice in the mid-1930s, but psychology as a whole did reflect upon the various problems with representing the Other as difference; instead, it adopted the notion of "culture" from anthropology to replace "race" as the new signifier of difference.

As a result, the so-called "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y seems to be more about replacing the old signifier of difference with a new one. Adopting "culture" as that signifier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psychology will relate to the Other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 Representing the cultural Other has become a battle with many fronts—domestic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 in non-traditional centers of psychology. It is also a battle in many forms—institutionally among members of the psychology establishment, discursively in the form of and right to representation, and "desirously" in the struggle with one's identity beyo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dealized mainstream American psychology.

Keywords: cultural turn, the Other, race, culture, signifier of difference, power-knowledge-desire relation, apparatus of discriminatory power

